

走出文革連載30

走出文革

在烈日和暴雨下

(接上一期)

這個回答也很妙，上帝說人人都會犯錯誤嘛。但紅衛兵們不懂幽默，折騰到最後，胡終於被迫亮了他的底綫：

“我是犯了嚴重錯誤的胡耀邦。”

在這之後，任憑紅衛兵們如何折磨他，他死也不開口了。紅衛兵們祇好解嘲地自己高呼“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胡耀邦！”草草收場。

如同他在人民大會堂的手舞足蹈，他手脚被縛的這一幕也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了。在他後來從總書記的位子上突然離開政治舞臺的時候，他在我記憶中的印象似乎格外鮮明起來。

在我年青時，我總是不可救藥地去關注大人物之間的政治鬥爭。當李維康和身旁的彭真親切交談，出色地完成着團中央交給我們的陪同任務時，我頭腦裏却在好奇着彭真和毛澤東之間的關係。當舞臺上出現毛澤東的巨大照片，全場掌聲雷動時，我轉向彭真，出乎意外地看到了他嚴肅冷峻的目光。

我心頭為之一震，仿佛是偷窺了天國的秘密。

一個月前，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敲響了文革大戲開幕前的緊鑼密鼓，但北京市委拒絕在北京各報轉載姚文元的文章。四個月後，毛澤東便在杭州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批判彭真的反黨罪行。

1965年12月9日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彭真的目光自然是內心的表露。

當汹涌的政治鬥爭暗流正在積聚力量，如同地殼下的板塊在互相擠壓時，中國的老百姓正在享受大饑荒後的溫飽和相對輕鬆的日子，全然沒有意識到覆蓋整個中國的政治大地震即將來臨。

1966年早春，北京市委組織的學習毛澤東思想交流會便是在這樣的政治氣氛下召開的。對即將被毛澤東下令改組的北京市委而言，這多少有點像是在“臨時抱佛腳”。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艾知生帶領我和“200號”(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的代號)的一個教師代表到西苑賓館參加了這次會議。

我和李維康在那裏不期而遇。會議期間的一天，代表們被安排去人民大會堂聽大慶油田“鐵人”王進喜的報告。當我在西苑賓館登上一輛去人民大會堂的大巴士時，突然看到李維康正站在車門口向我微笑。這意外的相遇使我們分外高興。當我們一起坐在人民大會堂聽報告時，我們已像久別重逢的朋友一樣傾心交談了。

人生的軌迹就是這樣奇妙。如果没有這次臨時抱佛腳的會議，如果我登上的是另一輛大巴，在茫茫人海中，李維康在我的記憶中不過是驚鴻一瞥罷了。

雖然她從十二歲就開始演戲，但這次交談給我的感覺是，她依舊單純可愛得像是一個和你鄰桌的中學生，讓你很想為她做點什麼事。

文化大革命給了我這樣的機會。

1967年秋天，清華大學紅衛兵組織井岡山兵團慶祝成立一周年時，準備邀請劇團演出樣板戲。聽

到這一消息後，我立即自告奮勇去中國戲曲學校聯系。我知道，當時全國所有學校的業務尖子統統被打成了“修正主義苗子”，受到批判。作為中國戲曲學校的業務尖子，李維康一定難逃厄運，或許我可以利用這次演出的機會幫她一點什麼忙。

在過去的一年中，我歷盡磨難，偶爾也會想到李維康的處境，但我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不可能對她施以援手。

1966年冬的一個晚上，浙江大學的竺苗龍、北京航空學院的範興言等人相約到清華找我。他們在文革前都是名揚全國的紅專典型，文革時受到批判。

在清華三院後面一塊黑暗的空地上，我們一起探索今後的命運。人如其名。竺苗龍仰天長嘯，憤恨對他的批判不公，想要上訴中央，討回公道。而範興言沉默寡言，祇打算逆來順受。我則勸他們靜觀待變，說了些天生我才必有用之類的廢話。(文革後，竺苗龍成為中國航天力學專家，並出任青島大學校長，又成了報刊上的新聞人物。而範興言則默默無聞地在湖南大學任教。)

那天晚上，我也想到了李維康。

當我在李維康的宿舍裏見到她時，她告訴我她曾到清華找過我，但我已離開學校，去外地了。

一年不見，她臉上天真的笑容已被密布的愁雲替代。文革開始後，除了和我一樣享受高規格的批鬥和大字報的辱罵嘲諷外，她還獲得了一項特殊待遇：每當烈日當空或者大雨傾盆時，她都要站在操場中的一張桌子上，一邊享受暴曬和雨淋的感覺，一邊高聲背誦：“毛主席教導我們：‘要經風雨，見世面。’”

老捨的一篇作品曾被選入中學課文中，講的是駱駝祥子在烈日和暴雨下拉車謀生的艱辛。在老捨的筆下，這暴曬和雨淋的感覺如同受刑。

在烈日下，“整個老城像燒透了的磚窑，使人喘不過氣來”，在暴雨下，“不曉得前後左右都有什麼，祇覺得透骨涼的水往身上各處澆”。

我實在佩服戲校學生的靈感和想象力，能將毛澤東語錄和老捨的文學作品揉合成對肉體和靈魂的戲劇性折磨。

當然，文革期間人為的烈日和暴雨比自然界的烈日和暴雨要酷烈得多。和那個時代的很多人一樣，李維康也被人為的烈日和暴雨所折磨。

讓李維康最痛苦的是，她被剝奪了唱戲的權利。她不僅不能上臺演出，就連吊嗓子和甩甩腰腿之類的日常練功也在禁止之列。

暴曬和雨淋可以損壞她的形象，禁止演出和練功可以廢掉她的武功。那些嫉妒她的人真是用心良苦！

對於這一切，李維康顯得很無奈。但我知道她的內心深處是不甘心的，她渴望回到舞臺上。

和全國所有單位一樣，當時中國戲曲學校的學生也分成了兩派。他們的分法倒也簡單有趣：演《沙家浜》的學生和演《紅燈記》的學生分別成了兩派的核心。演胡傳魁和李玉和的學生也就分別成了兩個紅衛兵組織的“司令”。

李維康說，《沙家浜》這一派的學生對她比較寬容。我決定去會一會這位“胡司令”。

胡司令和他的一班人馬在一間教室裏迎接我這個從井岡山來的“貴客”，他們已聽說我要在戲校



本報特約作家 葉志江

挑選一個劇團去清華演出，這可是他們和《紅燈記》這一派競爭的大事。

那胡司令和他的參謀長“刁德一”等人都是十多歲的大孩子，一個個乳臭未幹，可是和《沙家浜》裏的人物却又惟妙惟肖。尤其是胡司令，矮矮胖胖，還挺着肚子，活脫一個胡傳魁的袖珍版，令人發笑。

我忍住笑容，向他們宣布我的挑選標準祇有一條：要講政策，團結大多數人一起革命，特別是要團結李維康，不能搞體罰，要支持她上臺演出。

文革初期，清華井岡山兵團是全國聞名的紅衛兵組織，對胡司令他們有極大的吸引力。舞臺上的胡傳魁投靠了日本皇軍，這舞臺下的胡司令決定投靠清華井岡山兵團。

胡司令兩手在腰間一插，向我保證他們一定會保護好李維康。站在他旁邊的“刁參謀長”一邊點頭，一邊若有所思。我猜想他

一定是想起了《沙家浜》智鬥那一場戲裏的臺詞，覺得李維康“這個女人不尋常”，居然和清華井岡山兵團的人“有來往”，今後可得對她“安排照應更周詳”。(未完待續)

民國風雲錄連載7

民國風雲錄



本報特約作家 陳志飛

節選五 北伐與暗鬥

(接上一期)

二中全会正式通過北伐決議，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負責組織北伐總司令部。蔣同時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兼軍人部部長。蔣的盟兄、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當選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委員會主席。

本來眾人一致推舉李宗仁擔任北伐軍前敵總指揮，對於這個戰功顯著並力促北伐的急先鋒，可謂名副其實。但是，李宗仁尚有避嫌之德，他不想讓別人以為自己力促北伐就是為了升官，所謂“以義始而以利終”，因此極力推薦剛倒戈過來的湘軍師長唐生智擔任此要

職。其他人雖然不同意，無奈李宗仁態度堅決，形勢又不容等待，于是大家不再勉強，竟改舉唐生智出任前敵總指揮。

唐生智倒戈隱含的軍事投機傾向引起了陳獨秀的警惕。陳後來于7月7日在《向導》上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文中不指名地點出：“若其中夾雜有投機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使有相當的成功，也祇是軍事投機的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當蔣介石在北伐前綫讀到此文時，誤以為陳獨秀在攻擊自己，非常惱怒，寫信讓國民黨中央與中共交涉。

1926年7月4日，國民革命軍正式發動北伐戰爭。李宗仁第七軍為左路，唐生智第八軍為中路，李濟深第四軍為右路，同時向吳佩孚軍隊進攻。三軍士氣如虹，所向披靡，7月11日即克復長沙。第二期作戰于8月19日開始，從汨羅河戰綫發動全面進攻，到8月23日，北伐軍就拿下了軍事重鎮岳州。大批吳軍被北伐三軍包圍，紛紛繳械投降。

戰至此時，李濟深第四軍和李宗仁第七軍表現更好，分別被媒體譽為“鐵軍”和“鋼軍”，戰績都超過了唐生智的第八軍。這并不奇怪，因為前兩者受到革命精神洗禮的官兵，作戰更加勇敢和堅強。但是，由于吳軍官兵中兩湖人居多，

他們不願意向兩廣軍隊投降，寧可向前湘軍的唐生智第八軍投降，結果，步調慢一點的第八軍反而收編了最多的俘虜，繳獲了最多的武器彈藥。

對北伐大軍來說，在通往武昌的大路上，祇留下了兩個軍事要隘——汀泗橋和賀勝橋。奪下汀泗橋的重任交給了第四軍。他們于8月26日凌晨開始攻擊，激戰一晝夜，雙方死傷不輕。北伐軍雖在橋南端取得進展，然而汀泗橋仍然不克。

深夜雙方休兵之際，第四軍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派葉挺獨立團向汀泗橋東北的古塘角迂回，從右側後包抄敵人。當夜，張發奎親率黃琪翔第三十五團，利用附近港灣撈得漁船數十祇，將該團偷渡過去。第二天凌晨，葉、黃兩團突然猛攻守軍後側，正面部隊趁勢強攻，守軍頓時大亂，全綫潰敗，奪路而逃。北伐軍一舉而克汀泗橋。

吳佩孚祇留下了最後一個戰略要隘賀勝橋了。他見情勢危急，自己親到橋頭督戰，手持大刀，親啟旅、團長十餘人，令懸其頭于電綫杆上，以示退者必誅。因此，守軍的抵抗極為頑強，機關槍向北伐軍盲目掃射，疾如颶風驟雨。北伐軍士氣衝天，尤以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和張發奎第十二師最勇，前進官兵竟以敵人的機關槍所在地為目標，齊向槍聲最密處抄襲。守軍不支乃奔槍而遁。吳佩孚

乃以大刀隊阻遏，潰兵因後退無路，被迫向大刀隊作反衝鋒，數萬人一哄而過，奪路逃命。

北伐軍勇克賀勝橋後，本想乘敵軍喘息未定時，一鼓作氣拿下武昌。豈知武昌城垣甚高，堅實無比，城外并有護城壕溝，水深沒頂，且吳佩孚的守城部隊已早有準備。北伐軍一接近城垣，城上機關槍、手榴彈便一時俱發。北伐官兵前有堅壁，後有城壕，在敵人機槍敵射之下，傷亡極大，兩次攻城均告失利。

在北伐軍在到達武昌之前，官兵士氣極旺，大有“武昌指日可下”之勢。而蔣介石的嫡系第一軍尚未立功，讓他內心急躁起來。于是他調第一軍劉峙第二師趕赴前綫，要求該師攻城時帶頭衝鋒，讓各軍跟着衝上去。他自恃有東徵時強攻惠州城的經驗，沒有把武昌城放在眼裏，祇想讓自己的嫡系部隊顯示一下實力。

唐生智與蔣介石之間已有不快發生，他隨即表示，劉峙師祇是學生軍，沒有戰鬥力，應該遠離前綫。蔣認為唐以下凌上，是一種不能忍受的奇辱。轉而訓斥第二師師長劉峙說：“爾等如再不爭氣，何以立世見人！雖積尸累城，亦所不恤！”

蔣介石到達前綫後，于9月4日的軍事會議上，沒有分析和研究敵情，就武斷地下令：“武昌限于48小時內攻下。乘敵人立足未穩，一定要攻下！”大家面面相覷，祇得聽

命。蔣這是想用正式的場合強調自己的領袖地位，不容許任何以下犯上的挑釁。

豈料在接下來的第三次攻城戰中，忽然軍中謠傳劉峙師已攻入忠孝門，四、七兩軍聞訊大為振奮，益發奮勇爭先，死傷動輒整連整排，仍無入城之望。最後才知道是該師誤報軍情。這令蔣介石羞憤得無地自容，他在日記裏自表：“有生以來，愧悔愁悶，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

另一方面，唐生智第八軍的兩個師迂回逼近漢陽，兵不血刃，就迫得守敵反戈，一舉拿下漢陽和漢口，使得武漢戰場反敗為勝。這一來，唐益發桀驁不馴，幹脆給蔣寫了封信，說這裏的戰事大局已定，本前敵總指揮領本部兵馬完全可以對武昌城實行長期圍困，直至守敵投降，蔣總司令大可放心率領其他精銳之師開辟新的戰場，雲雲。

蔣介石看過信後，知道唐某人希望他離開此地，雖然憤怒于心，但也深感無奈。他在9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餘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否則人格掃地殆盡。”也就是說，他要親自到江西戰場上，證明給唐生智和其他將領看看。

不過，蔣介石將指揮重心轉入江西，在大局上完全正確，遵循了北伐軍原訂的戰略計劃。唐生智的排擠祇不過剛好歪打正着而已。

節選六 初現裂痕

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率北伐軍入江西後，與直系軍閥孫傳芳的精銳部隊大戰兩個月，幾番勝負。尤其是攻打南昌城，北伐軍前後共打了4次才完全占領。終于到1926年11月8日，北伐軍徹底摧垮

強敵，完全肅清了孫傳芳在江西的兵力。

在此期間，被圍困已久的武昌守軍發生嘩變，幫助唐生智所部拿下了武昌城。另外，孫傳芳從福建策動進攻廣東弄巧成拙，反被何應欽率部擊敗。整個北伐的形勢大好。

對於蔣介石來說，身為北伐主帥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報刊上也天天充滿了歌功頌德的報道；可另一方面，在這半年多的個人經歷中也體會到了太多的挫折。與唐生智的爭鬥，自己嫡系部隊的不爭氣，強攻武昌和南昌的沉重代價，非嫡系的不滿情緒，尤其是自身的錯

誤，都使之難以釋懷。就在攻克南昌的當日，蔣在日記中竟然沒有勝利的喜悅，反而寫道：“晚後唏然曰：三年來酸辛時自暗吞。歷史無事實，事實絕不能記載也。知我者其惟鬼神乎？”

非嫡系將領的不滿主要是因為蔣總司令對其嫡系第一軍的特

殊照顧。蔣不僅在軍需分配上偏心，在治軍上對該軍更是不論軍法而好私情。三軍將佐對蔣總司令的道德作風留下了很差的評價。李宗仁說：“就這點說來，蔣氏最多祇可說是偏將之材，位居主帥之尊，其智慧、德性，涵養俱不逮遠甚。”(未完待續)